

# 日美战争 1941 / 1945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美〕入江昭——著  
吴焉——译

Power And Culture

中信出版集团

非虚构

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权力与文化

日美战争 1941—1945

[美] 入江昭 著

吴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文化 / (美) 入江昭著; 吴焉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5

书名原文: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  
American War, 1941—1945

ISBN 978-7-5086-9363-7

I. ①权… II. ①入… ②吴… III. ①日美关系—研  
究—1941—1945 IV. ①D831.39 ②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7471 号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by Akira Iriye

Copyright © 1981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权力与文化

著者: [美] 入江昭

译者: 吴焉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186千字

版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5-7453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号: ISBN 978-7-5086-9363-7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献给费正清

## 序 言

本书旨在从 1941—1945 年亚太战争的两个主要交战国——日本和美国的视角，来探究那场战争的意义。这种两国并重的结构，使得这部专著与描述交战双方所有战役与政策的亚太战争通史，以及只研究一个国家背景的著作，都有所区别。我充分认识到，强调日本与美国必然会扭曲这场战争的不少特征，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写一部亚洲战争的叙事史，而是要根据这场战争中可以探讨的近代国际关系性质，将这场战争当作一件催化性的大事来写。

我的关键假设是，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可以被视为权力体，也可被视为文化体，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权力和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权力界定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战略、发动战争的潜力，包括使用武力的意愿，一个对社会制订和实施决策的政治体系，以及诸如对全球平衡和其他国家意图的看法这样更抽象的因素。一个国家的边界不仅仅是由地理因素来界定的，同时也会通过共同的传统观念，共有的宗教、艺术和文字根源，诸如习俗、生活方式等非正式机制，以及无数为归属这一实体的事物赋予大量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也是一种文化实体。因此这本国际关系专著必须包含对三方面的研究：权力层面的互动、文化交流，以及以上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联。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历史学家们才刚刚开始，试图阐明这个课题内在的方法论和分析法的各种复杂要点。在本书中，我提出通过仔细审视日本和美国给予这场战争的意义，对这一现象的一个方面进行初步的阐述。美日两国为了生存，彼此之间激烈战斗；每一方都动

员了全部的资源去摧毁另一方，而最终，拥有更强大军事实力、更胜一筹的战略，生产体系效率也更高的一方，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两国着眼的问题都超过了生存本身，而且都十分热衷于明确界定他们正在为保护什么而战。对国内社会和全世界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将走向何方，他们有成型的愿景。他们寻求以对自己、对彼此，而且想必对其他民族也有意义的方式，来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战争目标和和平目的。

通过对日本和美国声明战争目标的历史抽丝剥茧，可以合理地审视这场战争的象征意义，并且获得一些关于这场战争的文化意义的初步结论。对这场战争的军事意义和象征意义进行对比，能将日美战争视为了解现代国际关系全方位、多层次本质的一个研究案例。有意思的是，正如本书所述，日本人和美国人形成了一批类似的、有时极其相似的设想，于是最终，为了恢复他们一度能够和谐相处的国际秩序，双方都选择了一种“保守的”解决方案。本书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何种国际环境对不同权力和文化体系的和谐共处最为有益。我希望这种研究方法，将会激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近代史中的地位问题的全新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因美、英、日，以及其他各国档案的公开，获得极大推动。我虽然使用了一些档案，但从未奢望穷究所有可用的文献。幸运的是，关于这场战争方方面面的大量重要专著已经出版，其中一些已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列出。我本人因各国先驱学者的成果和贡献而受益匪浅。我因为集中在日本和美国活动，得以充分依赖两国杰出历史学者的著作。我尤其感激慷慨地让我共享其心得体会的朋友们：C.Hosoya、Y.Nagai、K.Usui、K.Kurihara、S.Asada、I.Hata、N.Hagihara、N.Homma、M.Kōsaka、D. 博格、J.W. 莫利、R. 丁曼、R. 达莱克、J.B. 克罗利、W.R. 路易、W. 拉夫伯与 E.R. 梅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几位同仁和研究者。整部手稿因 W.I. 科恩与 W.H. 海因里希斯两位的细致阅读，获益无法计量。C.G. 索恩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从欧洲和亚洲档案馆中发现的海量资料，而且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身在日本。我父亲这一时期大部分在中国度过，而我未来的岳父在法国。我根据他们二老的不同视角了解了很多事情，同样也从我妻子的角度取得了一定的认识。我妻子分别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生活过。不过对本书影响最大，而且赋予本书最多理性认识的人是费正清教授。他向我展现了综合学术操守和学术关爱的最佳典范，以及对这一理念的忠实：一个书写历史的人不能仅仅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是要顾及四面八方的读者，超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我在本书扉页上的题词，是在以一种适度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一位激励我超过 25 年的伟大学者和朋友的感激之情。

本书的研究课题始于 1974—1975 年之间，当时我获得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继而我的研究和写作又得到亨利·卢斯基金会、芝加哥大学社科部和远东研究中心的基金资助。安妮·钱、玛妮·维特、安东尼·张和苏·入江，分别以研究助理、编辑和打字员的身份给予愉快而卓有成效的帮助，令我从中受惠不少。

入江昭

1980 年 7 月于芝加哥

# 目 录

序 言 i

第一章 不确定性的终结 1

第二章 流产的“新秩序” 33

第三章 重定战争目标 87

第四章 日美和解 133

第五章 战后亚洲的产生过程 189

第六章 结 局 229

注 释 237

参考文献 255

# 不确定性的终结

1941年12月7日（亚洲时间为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在此之前，美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数年之久的“冷战”。与1945年之后更为著名的那场冷战一样，两国之间的关系经常被表述为在根本问题上的冲突、迫在眉睫的劫难，以及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全面对抗。然而，正如后来美苏两国避免直接武装冲突，华盛顿和东京当局也都在设法维持一种留有谈判空间的关系。更加重要的一点在于，尽管相互指责，而且存在对战争的恐慌，但这两个民族并没有断绝一切联系；相反，好战言论下潜藏着一股暗流，主张双方可以共享利益，而且都认为双方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协调一致的。尽管如此，正是对这种看法的坚持制造了一种不确定感；因为这样的看法与横跨太平洋的两国政府之间急速恶化的关系格格不入。

战争来临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军部首脑和他们的民间支持者决定弥合美日差距，给“冷战”一个了断。他们企图统一全民族的感受，从而使战争将所有政治行为也定义为文化行为。如此一来，他们决定立即从根本上抛弃明治维新以来建立在日本对外事务基础上的国民生活的早期定义。日本人曾经以努力让国家融入世界经济、迅速取得工业发展成果、注重共同生存必不可少的种种条件而著称。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日本采用金本位制度，恢复关税自主权，推动国家出口贸易，鼓励对外移民和殖民地开拓，此外还试图像先进工业化国家集团的一员那样行事。这是一项从来都不易完成的使命，而且偶尔会与其他列

强产生摩擦，但至少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为止，日本的国家领导人达成了一种统一认识，即日本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应当按照“国际合作”准则，同其他先进国家通过多边协定组织来解决外交问题。<sup>1</sup>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热切地接受由英美两国主导、包含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条约在内的国际合作体系。日本人热切地转入英美轨道，以伍德罗·威尔逊的“新外交”原则为本国外交活动的指南。日本经济完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国家以国际联盟理事会唯一非西方成员国的身份，享有世界强国地位。日本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内战危及外国人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亚洲的反殖民地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受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鼓舞和共产国际特工的指导。日本仍然以先进的殖民国家以及“条约”组织强国一员的身份，通过同英美两国持续磋商，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日本或者英美两强都没有超脱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行谈判，但通过与其他工业国家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合作框架，还是给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平衡点。

始于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一个国际事务混乱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来临，这在各国的长远关系和日常关系当中都有所体现。有一些国家断定，现行的对国际贸易和货币兑换放任自流的经济秩序，应当被更具排他性的协定，以及通过全球性的划分组成各种封闭单位的“新秩序”取代。日本是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国家之一。

在外交方面也一样，日本人看到一种背离国际主义，并且倾向地域主义的趋势，少数国家在按照这一趋势建立对更广大地区的控制。这种趋势下仍存在“合作”，但那是以一种致力于维持封闭权力体之间的平衡而进行的合作，例如英国和纳粹德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合作”。

同 1929 年之前的形势相比，这种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可供参考的固定要点更少了，国际联盟、华盛顿体系，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建立在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基础上的世界

金融秩序，一切用于界定国际关系的手段正在失效。世界各国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谋求经济增长，维护国内秩序，增加国民财富，但是他们更加乐意使用武力，并且不顾国际合作，实施单边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全球的相互依存、国际合作，还有和平，不再是流行语；“新秩序”“贫困国家”“生存空间”等更具排他性的概念出现，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支撑 20 世纪 20 年代国际体系的是这样一种设想，即认为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反之亦然。而这种设想将要让位于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涉及国内与国外事务关系，也涉及权力同外交关系非军事化方面的关系。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的政策意欲克服这种不确定性，但这种尝试仅取得局部成功。从某种层面来说，取得成功的是那些让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满洲）和华北经济发展和人口实施的项目。日本计划让日本本土的“拓荒者”前往中国东北定居，使当地经济改观，尤其通过增加当地的农业产量，更好地为扩张的日本帝国服务。1937 年，日本制定了一项为期 20 年的计划，号召最终让 100 万户总共 500 万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定居。<sup>2</sup> 1931—1945 年间，大约 50 万日本人实际移居中国东北，其中包括大约 25 万离开日本农村前往伪满洲国务农和从事乳品工业的农民。甚至连十多岁的少年也被招募，其中 5 万少年散居在伪满洲国边境地区。<sup>3</sup> 初到中国东北的拓殖者，沿南满铁路线定居。新财阀（工业金融财阀）希望工业化能够与农业发展同步进行，这样中国东北就能为日本剩余人口提供空间，同时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食品和工业制成品，使日本的自给自足更加有保障。

1935 年以后这个计划向华北延伸。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派遣多个研究考察团调查华北的潜在资源和需求，根据《辛丑条约》，驻扎在中国的日本驻屯军（简称“中国驻屯军”，也通称“天津驻屯军”）开始开发当地的矿产资源。东京的日本政府正式批准这些行动。到 1936 年，日本内阁还制定了一份在日本和伪满洲国监督下进行的华北经济发展计划。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华北成为日本各路远征军的

一个重要补给来源，因此日本新设立了一个企画院对那里的各种经济条件进行专项研究。该计划的成果之一是在1938年组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会社资本金为3.5亿日元，政府出资占一半。这家半公公司会从事交通运输、通信、电子工业、铁矿，以及其他一些事业。<sup>4</sup>

同一时期，日本促进了同伪满洲国和中国（即所谓“日元共同体”）的区域贸易。1936年，对伪满洲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5%，到1938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增加到40%以上，而同期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从占进口总额的14%，增加到22%以上。<sup>5</sup>

1938年11月，日本明确提出了一个“东亚新秩序”的概念。“东亚新秩序”的意义绝非一个空洞的口号，实际上是对日本密集干涉中国东北和华北经济事务，从而尽可能多地通过该地区满足日本国家需求的政策，进行的一种事后合理化追认。

另一方面，“大亚细亚主义”在日本政府内外都产生了影响。日本的政论家们阐述了亚洲团结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包括苏联）的理论。某些政论家是传统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必须以反对西方影响，来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赋予一种神圣名义。但为数众多的其他政论家并不是简单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由衷地相信日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指导这个国家继续发动战争。他们认为，亚洲人的团结性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唯物主义、自私自利、帝国主义，以及其他代表堕落西方传统的一切特质的对立面。（与“堕落”的西方特质）相反，“大亚细亚主义”强调诸如区域合作、和谐、无私，以及个人服从集体的主题。

矛盾的是，这场宣传运动的强度，恰恰是西方对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坚忍不拔的证明；越来越多的作者发现，必须强调让人们的思想从对西方思维模式不自觉的遵循当中解放出来的极端重要性。如宇田久志（Uda Hisashi 音译）1939年关于对华文化政策的颇有影响的论文中所写，日本人以落伍为由，看轻东方事物，疏远中国文化已经太长时

间了。在军队以外，很少人对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地方知之甚详。然而，现在日本应当“给长期依赖和模仿西方的历史彻底画上句号”。在中国的战争必须通过为了新时代的新文化观念来支持，要开始认识到西方导向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已经不是在为国家服务。这个国家的文化和知识领袖必须克服过去对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迷恋，回归“日本先天的智慧”。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能够把握对华战争的重要意义。<sup>6</sup>中日战争部分被视为清除西方对日本人心灵和思维方式影响的心灵战争，而不仅仅是让顽固对抗的中国人顺从日本意志的举动。一旦日本人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就可以在“大亚细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世界秩序。

20世纪30年代晚期，日本的舆论宣传大力强调以重建、新生、觉醒和再生为基础，说明他们关于结束西方主导模式，恢复亚洲昔日辉煌的自觉意识。日本作家众口一词地指出，东方拥有一种合作、和谐、相互尊重、整合包容，以及社会一体化的传统，这种传统与西方的利己主义、不断竞争、冲突和帝国主义恰恰相反。日本正试图恢复这种光荣传统。法律学者泷川征次郎（Takigawa Seijiro 音译）指出，“亚洲新秩序”将会建立在对西方观念的否定和亚洲文化戒律的基础上。日本是亚洲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者，处于建立“亚洲新秩序”的领导地位。中国是日本最紧密的近邻，注定将会成为重建亚洲事务的第一个合作伙伴。<sup>7</sup>尽管如此，日本的作者们仍一再引用冈仓天心的论述，声称所有亚洲国家在“大亚细亚世纪”到来时，会成为一体。所有人都赞同为了让亚洲从西方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发展是必经之路，而文化的统一会确保经济发展不重蹈欧美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覆辙。

尽管存在这类雄辩和其试图使自身正当化的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日本的对外事务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仍欠缺一致性和连贯性。虽然日本人常常谈到“大亚细亚新秩序”，但从未成功推出实现这一宏愿的系统性计划。因为伪满洲国和华北只能供应日本急需的

部分资源，这个国家为了输入棉花、羊毛、石油、橡胶和小麦等商品，还要继续依靠日元共同体外部的国家。这些商品大部分从美国、印度、东南亚和大洋洲输入。这些地区同英镑和其他欧洲货币体系挂钩，对日本进口商品树立了保护性关税壁垒。因此日本几乎一直在同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的贸易中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尽管处于世界经济萧条的混乱时期，而且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招致怨恨，美国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38年上半年，日本进口总额为1,394,000,000日元，而美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价值为460,000,000日元，以棉花、石油、钢铁和机械产品为主。这些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对中日战争的继续进行至关重要，“大亚细亚主义”的滔滔雄辩也无法使日本脱离这些商品行事。

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对亚洲以外的市场和资源供应的依赖性，这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外国经济压力的冲击。前日本外务省官员、松冈洋右的知己斋藤良卫（Saitou Yoshie 音译）在1938年指出，西方强国的持续经济抵制将会使日本国民经济严重受损，破坏日本为快速发展制定的各种计划。斋藤断言，使日本和中国经济完全一体化，是日本减少对其他国家依赖性的唯一可行途径。<sup>8</sup>但事实上，斋藤不得不通过一份在政府内部秘密传播的400页卷宗提出论据，说明建立大亚细亚经济体制缺少一份蓝图。

实际上，日本政府内部痛切地感受到对亚洲缺乏足够的认识，更不用说拿出一份系统行动计划在亚洲实施了。1938年9月，日本企画院设立东亚研究所，负责研究中国、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生态、经济和人种学等各种情况。对英美列强的战争爆发时，这些研究还远没有完善。同一时期，外务省内部成立了一个计划委员会，负责分析世界经济趋势对日本政策的影响。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成果是1939年4月出台的一份500页卷宗，可以在限定的人员内部传阅。标准化的陈词滥调在这份卷宗中再度重申：基于区域集团化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重建，除了亚洲之外，这种秩序在世界各地都正在扼制日本的扩张能量。日本的当务之急是与中国和伪满洲国合作，在亚洲建立一种经济自给



的“新秩序”。日本必须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拓展商贸活动，促进当地的工业化，提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此后一旦爆发战争，日本将会处于一种更为强势的地位。<sup>9</sup>

尽管如此，这一显然十分明确的主张还是包含着不确定性的因子。日本的“共荣政策”被视为一种对其他地区集团化发展态势的防御性反应，从而合理化。言下之意是，日本这样做是在追随当前的全球趋势，如果1929年之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种更为自由的交易体系重建的话，那么它会毫不犹豫地回归。此外，东亚共同体集团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给自足；外务省的研究报告指出，日本仍然必须从欧美列强及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获取石油、橡胶、镍、锡、铜，以及其他原材料。因此，日本不能像大亚细亚政策所规定的那样，同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自由贸易。换言之，迟至1939年，日本的外交政策也无法始终坚持“大亚细亚主义”。一种西方导向的意见暗流不时浮出水面，似乎在告诫日本，完全独立自主的“大亚细亚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官员认识到日本经济对非亚洲国家的依赖性，而且知道教条式的反西方外交会让日本孤立，此外一无所获。

总之，随着侵华战争深陷泥潭，似乎更加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的谅解。首先，陆军正在为对苏备战忧心忡忡。1939年5月的诺门罕战役，证明了苏军空中力量和机械化地面部队的优势。为了应对危机，日本必须通过政治手段结束在中国的军事冲突，但这可能需要英美的斡旋。东京的日本政府对美国的善意尤为关注。同年7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废止美日两国的贸易协定，日本政府大为懊恼。这份声明非但没有使日本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相反使日本更为坚定地谋求同美国和解。美国问题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证明了关于“东亚新秩序”的所有官方论调的虚弱性，指出了日本政策潜在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sup>10</sup>

如果说大亚细亚地方主义国策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少有落实，那么在文化一体化方面的成就更加乏善可陈。20世纪30年代末，日中文